

南宋舆地图及其文学书写

李光生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 无论是作为学术话语对象还是业余话语对象, 基于《禹贡图》和《华夷图》这两种模式绘制的舆地图, 因媒介的发展和科举考试的需求引起了南宋士人精英们的极大兴趣, 折射出他们执著的“中国”观念和政治理想, 也成为他们自我定义士人身份的重要工具。南宋诗文中的舆地图, 既是文人阅读的情感反应, 更意味着对失地的提醒、对家园的记忆及对帝国的想象, 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文人们通过泪水、家国、故都等诸多隐喻表达了力主恢复的强烈渴望。

关键词: 南宋; 舆地图; “中国”观念; 文学书写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79(2025)03-0062-07

DOI: 10.16698/j.hpu(social.sciences).1673-9779.2025.03.008

Geography map and the literary writing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LI Guangs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Sichuan, China)

Abstract: No matter as the object of academic discourse or amateur discourse, the map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based on the two models of *Yu Gong Tu* and *Hua Yi Tu* have aroused great interest among the scholar readers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media and the demand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reflecting the “China” concept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of cultural elites rooted in the map.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tool for them to define their identities as scholars. The geography maps in the poetry and literature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are not only the emotional response of the literati reading, but also the reminder of the lost land, the memory of the homeland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empire, which has rich cultural implications. The literati express their strong desire for restoration through many metaphors, such as tears, home country and old capital.

Key words: Southern Song Dynasty; geography map; “China” concept; the literary writing

舆地图是国家领土的图形表示, 是国家地理、政治、历史、文化等在图形上的体现。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领土无疑是地理学的概念, 但是它

首先是一个法律—政治概念: 某一权力所控制的领域”^[1]。葛兆光先生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待地图, 认为“地理空间划分与描述是政治、历史和文化

收稿日期: 2024-02-27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2019-CX-017)。

作者简介: 李光生(1973—), 男, 湖南嘉禾人,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Email: lgsh512@163.com

的结果，但是，地理空间反过来又是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标志”^[2]。在南宋，基于《禹贡图》（或云《禹迹图》）和《华夷图》这两种模式绘制的舆地图，因宋王朝的疆域变化、媒介的发展及科举考试的需求引起了士人精英们的极大兴趣与关注，折射出他们执著的“中国”观念和政治理想，也成为他们自我定义士人身份的重要工具。诗文中的舆地图，意味着对北方失地的提醒、对故土家园的记忆及帝国想象，透露出文人的身份意识，表达了力主恢复的强烈渴望。

一、舆地图的模式、载体与“中国”观念

现存最早的覆盖古代中国王朝版图的舆地图，可以追溯到南宋。在12世纪首次公开发行的舆地图主要基于两种模式：《禹贡图》和《华夷图》。《禹贡图》提到了出自《尚书·禹贡》里有关帝国的神话之旅，《禹贡》中描述的中国领土的九个主要区域，即“九州”，成为代表王朝的典范。通过与儒家经典的联系，这些地图在人们所认定的中华文明原始条件下确立了领土统一的目标。“禹迹”出自《左传》“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3]，意味着要求收复失地。关于《禹迹图》，在其神话般的帝国之旅中，大禹所涵盖的所有领土都被宋朝和外国地名所覆盖。它们以这样一种方式被绘制出来，是为了验证宋朝对失陷于其北方邻国辽国和金国的领土主张是正确的，宋朝与外夷的地理所在显示了它们本应在的地方，而不是它们在南宋时的位置。《华夷图》通过指出大量位于帝国边缘的蛮疆和夷狄，扩展了大禹的帝国行政区划模式，将帝国置于广阔的地理环境中。虽然这两类地图在对周围蛮夷政权的关注上存在差异，但都展现了同一幅持久文明的形象。尽管在历史现实中，它们已然发生了变化，但其地理坐标是普遍固定的。这种地理坐标展现了一个自古以来就被定义为“九州”的土地共同体的理想形象。

事实上，北宋后期便已出现绘制于石碑上的舆地图。1121年，荣县出现了一通“九域守令图”竖碑，它标识出1400多个直到县级层面的政区，是现存最早的基于县级层面的综合性地图。荣县知县承认，在官方舆地图上绘制的类似地图正在流通，但这张地图已经更新，以反映行政组织的

频繁变化^[4]。随着北宋灭亡，地方资助石碑地图的现象逐渐增多，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金朝入侵并占领之后的宋代石制舆地图的著名例子，包括1136年的《禹迹图》、1142年的《禹迹图》和1136年的《华夷图》等。1136年的《禹迹图》每幅尺寸约为80厘米×80厘米，被刻在一块石板的两侧，这可能是因为它们主要是用来复制拓片。在刘豫的伪政权统治下，这块石板被截为两段^[5]。有关该地图绘制参与者动机的证据仍然匮乏，但无疑保留了一个统一帝国的记忆。

舆地图作为帝国象征的力量，最直接体现在由王致远1247年资助的石刻《坠理图》上。该图由黄裳绘制，并在1190年将它进呈给未来的宋宁宗，王致远从黄裳的家人那里得到了这幅地图^[6]。位于这一大型石碑底部的文本，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分裂时期比统一时期更为普遍，并提醒读者，宋朝开国之君认为，直到收复燕云十六州，他们的使命才算达成。另一典型的存世例子是《舆地图》发现于京都东福寺藏品中的这幅地图^[7]，通过拓本（207厘米×196厘米）保存下来。它不仅展示了县级以上的所有行政单位，还展示了进士解额、山口、族群和周边政体。

舆地图在12—13世纪的印刷材料中愈发明显。12世纪，王朝的印制地图出现在各式主题的图书中。在作为经学注疏和教学工具的作品中，包含着带有古今地名为特色的地图，提供了对经学的解释。相关例子包括杨甲（约1110—1184）的《六经图》和唐仲友（1136—1188）的《帝王经世图谱》等。舆地图也见于《佛祖统纪》这样的佛教文本中。《佛祖统纪》是一部以国史类型为蓝本的佛教通史，涵盖了从981年到1265年之间的时间段，书中有三幅地图，其中一幅是宋王朝的行政地图，描绘了大约1121年划定的路并显示了州府。一些史学著作，诸如吕祖谦的《五代史详节》中，也包含地图^[8]¹²。这部著作的宋版上有一幅10世纪占领汉人领土的国家地图，该地图顶部一层显示北宋诸路的地图，将以前的独立政权与宋王朝的行政分区彼此关联。

由北宋税安礼撰、南宋赵亮夫增补的《历代地理指掌图》是我国传世的第一部历史地图集，也是一部带有地理总志性质的重要文献^[9]⁴⁶⁻⁷⁹。该图集在12世纪30年代和13世纪70年代之间刊印，一共由《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历代华夷山水名图》《〈禹贡〉九州图》《帝眷九州图》《虞舜十二

州图》《商九有图》《周职方图》《春秋列国图》《秦郡县天下图》《西汉郡国图》《东汉郡国图》《三国鼎峙图》《隋氏有国图》《唐十道图》《萧齐南国图》《元魏北国图》《圣朝太宗统一图》《圣朝元丰九域图》等44幅图组成,大多数图幅是以《禹贡》“九州”为基础编绘的^[10]。它采取双重的编辑方案,展示了许多特征。首先,按照一般到特殊的组织原则,一览图放在特定时间的地图前面。前两幅地图是通用的,旨在概述历史上最重要的行政区划,以及对主要地形特征(山川、河流和湖泊)的定位。随后的地图将重点放在中国历史上的特定时期。最后一幅地图显示了由山川和河流形成的南北边界。根据僧人一行(683—727)的说法,它们是把“中华帝国”与周边民族和国家划界的自然基础^[11]。在每一种情况下,一览图的位置都会影响接下来地图的阅读。它们提供了阅读特定时间地图的框架。其次,将特定时间的地图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系统涵盖了中国领土政治历史上所有重大变迁^{[12] 117-118}。

正如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认为印刷出版与更广泛的知识活动之间具有相关性一样,在宋代,各种媒介(石碑、手稿和印本等)中地图的出版和士人读者可以获得舆地图,促进了人们对作为学术话语对象的舆地图产生更大的兴趣。地图的出版也与关于地图制作和阅读更广泛的业余话语密切相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朱熹关于程大昌(1123—1195)《禹贡山川地理图》的通信。其在《答程泰之》中云:

熹昨闻《禹贡》之书已有奏篇,转借累年,乃得其全。犹恨绘事易差,间有难考究处。近乃得温陵印本,披图按说,如指诸掌,幸甚幸甚!此书之传,为有益于学者。但顷在南康两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东陵、敷浅原之间,而考其山川形势之实,殊不相应。因考诸说,疑晁氏九江东陵之说以为洞庭巴陵者为可信。盖江流自澧而来,即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东也。若谓九江即今江州之地,即其下少东便合彭蠡之口,不应言‘至东陵然后东迤,北会于汇’也^[13]。

程大昌(字泰之)的《禹贡山川地理图》在当时影响极大,俨为经典。在信中,朱熹提出了关于地图的几个问题,并指出地图中对南康特点的描写,与他本人对该地山川河流的观察(按:朱熹曾于1179—1181年间知南康军)并不相符。根据当前的地形特征,朱熹的讨论,本身属于文

化精英的业余话语,实则是对经典地图的一次重构,体现出宋代文化精英对帝国疆域的关注。

科举考试对士人学习的影响也是人们对舆地图和地图集产生兴趣的重要原因。12世纪的中国地图集是重要的教学参考书。正如比利时著名汉学家魏希德所云,它们(地图集)的出现恰逢各种各样的从行政类书、历史类书到散文选集和文体手册等教学与科举用书的编纂和印刷^{[12] 115}。阅读这类作品的对象主要是准备应举的学子,其人数在几十万人之间,据估计有40万人参加了13世纪中叶最低层次的发解试^[14]。南宋学者费衎认为《历代地理指掌图》正是针对举子应考的著作。《梁溪漫志》载:

今世所传《地里指掌图》,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详,论次有法,上下数千百年一览而尽,非博学洽闻者不能为自足以传远。然必托之东坡,其序亦云东坡所为。观其文浅陋,乃举子缀辑对策手段。东坡安有此语?……此岂出于东坡之手哉?^[15]

费氏指出苏轼非《指掌图》编者,并认为地图集中的地图将用于那些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策问的举子。元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程端礼(1271—1345)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列举《历代地理指掌图》和《禹迹图》这两部书作为学子的必读书^[16],也印证了舆地图的教学价值和科举旨归。

众所周知,在两宋时期,西夏、辽、金以及蒙古相继与宋并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代中国,在北宋发生了变化,民族和国家有了明确的边界。欧阳修曾上呈《乞令边臣辨明地界》《奏北界争地界》《论契丹侵地界状》等奏折,要求划清地界,确定你我。如《乞令边臣辨明地界》云:

窃以北虏创立寨栅,已违誓书。然犹在彼界内,可以佯为不知,不须紧问。兼万一中国却有兴修去处,可以引彼为词,以塞问难。虽然如此,亦当早为预备,便合于界首分明界防,彼亦必更南侵,事既造形,理须杜渐……伏乞早降朝旨下边臣,速令止绝,辨理地界,早见分明^[17]。

然而,到南宋,“中国”已从“八尺方床”收缩为“行军帆布床”^[18]。杨万里《初入淮河四绝句》云:“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19]伴随宋帝国疆域不断收缩的则是国际格局的变化,正如许倬云所说:“其他诸国与宋国,其实不是边

睡的外在‘他者’，而毋宁是互为他者，共存于同一国际格局之中”^[20]。在不同政权的控制区域，服装、习俗、文化都出现了“华夷”差异。范成大在《揽辔录》中记载原来北宋汴京如今是金国南京的情景：“东京虏改为南京，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反以为便，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21]楼钥记载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县）“人物衣装，又非河北比，男子多露头，妇女多‘耆婆把’，车人曰：只过白沟，都是北人，人便别也”^[22]。“露头”指髡发，“耆婆把”指插戴双鸟钗，都已是异族服装。在此背景下，宋代士大夫的“中国”观念变得执著而强烈。他们在观看舆地图时往往会产生更多的所思所想，这在他们有关舆地图的诗文创作中亦深有体现。

二、“恢复”主题：南宋文人关于舆地图的书写

南宋文人们不仅在日常话语中频繁地提及舆地图，在诗文写作中亦然。在这些诗文中，舆地图意味着对失地的提醒、对家园的记忆及对帝国的想象，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文人们通过泪水、家国、故都等诸多隐喻表达了他们阅读舆地图的深切感受和力主恢复的强烈渴望。

（一）舆地图成为失地的提醒

释文珣（1210—1280）曾作《观禹贡九州历代帝王国都地理图》诗云：“万里江山几废兴，览图真合拊吾膺。三王二帝皆难问，两汉六朝何所称！此日中原全拱北，异时深谷或为陵。看来今古皆如梦，梦境虚无岂足凭。”^[23]³⁹⁶³⁴虽然僧人文珣本意是想通过地图与现实的差距来凸显佛教万法皆空的基本真理，但这首诗也表明，这幅地图对他来说，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作为失地的提醒，即地图与南北之间的领土并不对应——属于中国的大片北方领土并不在南宋帝国的管辖之下。

“泪水”成为文人观看舆地图的特定意象，是失地一种强有力的提醒与证明。陆游作于庆元三年（1197年）的《夜观子虚所得淮上地图》诗云：“闭置空斋清夜徂，时闻水鸟暗相呼。胡尘漫漫连淮颍，泪尽灯前看地图。”^[24]²³³¹诗人虽知恢复无望，却依然念念不已。曾经同属京西路北路的淮水和颍水如今只能在地图中重现，现实中这两地

沙尘漫漫，分别属于南宋和大金两个政权所管辖，这怎么不令诗人“泪尽”神伤？其《夜观秦蜀地图》诗亦云：

往者行省临秦中，我亦急服叨从戎……咸阳不劳三日到，幽州正可一炬空。意气已无鸡鹿塞，单于合入蒲萄宫。灯前此图忽到眼，白首流落悲涂穷。吾皇英武同世祖，诸将行策云台功。孤臣昧死欲自荐，君门万里无由通……何当勒铭纪北伐，更拟草奏祈东封^[24]¹¹²⁴。

诗人以光武帝喻孝宗皇帝，希望自己像当年窦宪出鸡鹿塞让匈奴臣服一样能挥师北伐收复咸阳、幽州等北方失地，然毛遂自荐而不得，只能夜观地图。地图中秦地与蜀地本是宋朝的辖地，而今秦地成为了失地。

刘克庄《感昔》一诗更证明了眼泪作为北方领土长期沦陷所造成的创伤的象征所具有的持续力量：

先皇立国用文儒，奇士多为礼法拘。澶水归来边奏少，熙河捷外战功无。生前上亦知强至，死后人方谏尹洙。蝼蚁小臣孤愤意，夜窗和泪看舆图^[25]。

诗人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宋廷的“文治”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澶渊之盟的屈辱和议及熙河之战的毫无寸功，即便有强至和尹洙等爱国大臣追随韩琦等名臣抗击西夏，亦无力改变失地的惨痛现实。诗歌虽言北宋事，实则对偏安南宋的大片失地深感痛惜。“蝼蚁小臣孤愤意”，既指强至、尹洙，也借指自己。诗人观看舆图满含泪水，是因为代表“中国”的南宋在舆地图的边界与现实的领土收缩形成了巨大反差。

（二）舆地图与家园记忆

南宋时的北方领土，现在是女真人的家园。已经接受了金国统治的汉人，不管他们离核心有多远，都被认为是典型的中国人。他们以不同方式描述了失地的创伤。南宋关于舆地图的诗文中，“以国为家”的焦虑感，与相对的归属感或至少是一种对归属感的渴望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一特征，成为对家园的反复隐喻。

事实上，12—13世纪的大部分诗人都没有亲历靖康之难的流离失所乃至家破人亡，但他们在话语中参与了此事。在这种话语中，尽管国家处于危机之中，但它在其规范的最大范围内被呈现为“家园”。诗人通过无家可归的形象，表达了对

领土丧失的挫败感。失地和无家可归的记忆与舆地图的存在联系在一起。陈应龙明确地把对失去北方的挫折感与对失去家园的怀念相提并论。其《呈徐宪应特》诗云：“弱冠弄笔砚，耻为章句儒。夜半剑气发，精光射天衢。欲分天子忧，张灯阅地图。七闽山水秀，我亦思故庐。世事苦齟齬，吾道甯踳蹢。”^{[23] 32233}地图让读者想起北方沦陷的领土，激起人们无家可归之感，也激起了诗歌的主人公——黑夜中孤独的学者弃笔从戎替君分忧的强烈决心。“故庐”，是诗人想回到的地方，正如段义孚对故土心理的思考所表现的那样，理想中的家与安全可靠的过去联系在一起^[26]。而今，“故庐”只有在“张灯阅地图”的情境下才能出现。

地图既是失地的标志，同时也是对家的现实提醒，使人们对回归的渴望得以延续。著名的爱国诗人张元干在《建炎感事》中写道：

检校舆地图，宁复见施設。三吴素轻浮，伤弓更心折。四顾皆惊波，苍黄共呜咽。维兹艰危秋，贫士转疏拙。明年谷增贵，贤愚周分别。何处置我家，患在建午月。故山盍早归，岂忧践霜雪^{[23] 19895}。

诗人通过在舆地图中标示出覆灭了了的北宋王朝疆域，呈现出个人的孤独和人们的流离失所。在这里，诗人还致力于重建在旧山中的故居。正如《历代地理指掌图》所示，五岳构成了王朝帝国的基础，其中四岳在北方。诗歌表达出对回归故居（北方）的渴望让诗人忘记了到达那里的种种艰辛与痛苦。晁公溯《得东南书报乱后东都故居犹存而州北松楸亦无毁者》云：

一朝忽弃洪河南，来归舆图丞相府……遗民相对向天泣，耳冷不闻长乐钟……世人宁有金石坚，定恐不见全盛年。出门恍惚忘南北，故国何在山连天^{[23] 22395}。

对诗人来说，眼前的地理环境让他迷失方向。当失去了中心的家园，等于失去了世界本身的定位。人们一旦无法区分最基本的南北方向——即构成皇帝面南的政治世界的方向，所有的方向感将随之消失。构建自己周遭世界的的能力，首先取决于“故国”的恢复。这里的家园由巨大而永恒的山脉所界定，这些山脉将中国世界与缘边夷狄分隔开来。凡此意涵，皆由“来归舆图”导引出来。

（三）舆地图与帝国想象

在有关舆地图的诗文中，宫廷和都城在帝国想象中有着非比寻常的特殊意义。正如前文晁公溯的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那样，金军夺取宋朝的乐器和乐工，暗示了宫廷音乐的消亡，象征着宋帝国的灭亡，也导致了北方大批人们的无家可归。声名不显的诗人胡仲弓（活跃于13世纪50年代）《观中原指掌图》云：“月明空照八陵碑，玉馆琼楼失旧基。故国不堪回首处，西风满地黍离离。”^{[23] 39835}当诗人看到一幅中原地图，思绪被带回到了位于北方前都城的宫殿和陵墓。诗人用被毁坏被废弃的宫殿遗址等诗意的比喻，描述了宋王朝的衰落。曾经美好却失去了的家园，受到了日益衰败的影响——西风代表着来自周边的入侵。

在南宋文人士大夫看来，舆地图的恢复必须从与之最密切的都城的恢复开始，张元干在《奉送李叔易博士被召赴行在所》中云：“君尝手校舆地图，上下千载铅黄朱。斯人魁磊岂假此，愿见克复东西都”^{[23] 19900}。北宋有所谓“四都”，东、西都即开封和洛阳。“四都”均是帝王行政基础的永久性特征，因此对维持空间秩序必不可少。舆地图所标示的范围千年来都是帝王的象征，而今连都城皆落入异族之手。被破坏的宫殿场地和都城杂乱不堪的图像让读者回到了地图上，地图为被洗劫的家园重建提供了设计的愿景。手中校对的这张舆地图，显示了诗人记忆中重现的都城。

除了都城和朝廷，帝国的其他部分尤其是燕云十六州也成了它的转喻。自宋朝建立以来，燕云十六州一直是北宋试图通过对辽朝武力或谈判收复但没有成功的地方。在地图上看到沦陷的燕云十六州名字，不断提醒人们宋朝管理结构的弊端。《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一览图显示，燕云十六州在“帝国”范围内。特定时间的地图，显示了契丹辽朝在938年如何成为这些地区公认的统治者，并且在11世纪80年代，当地图集中收录的宋朝地图被绘制出来时，这些地图仍然在他们的控制之下。^{[9] 94}在《本朝化外州郡图》中，这些必争之地的地位得到了最充分的说明。与西部和西南边陲的其他州一样，燕云十六州被特别标记为化外州。在这些化外州中，“虽贡赋，版籍不上户部”^{[9] 94}。地图集的编者承认，这些化外州已落入辽朝的控制，但同时也表示，这些化外州仍处于宋王朝的影响之下。

对于地图的观看者来说，燕云十六州是收复失地计划中的一个焦点。对此，张元干在《奉送李叔易博士被召赴行在所》一诗的末尾提醒读者：“胸中远略指诸掌，表里拄腹撑肠书。深知祸起取幽蓟，颇觉气王吞青徐”^[23] 1990。“幽蓟”即幽州和蓟州，是燕云十六州中的两个州。“取幽蓟”一直是宋王朝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口号。^①与众多有识之士一样，虽然张元干对南宋初期统治导致北方沦陷深感不满，但收复失地的理想依然存在。在研究舆地图后，张元干指出，南宋军队现在必须通过青州和徐州来实现这一理想，因为这两个州位于燕云十六州以南。

南宋诗文中的舆地图，既是失地的标志，象征着持久的挫败感，表现了南宋文人对政治现状的失望之情，而这也恰恰是他们渴望恢复的一种表现，正如陆游所说：“行年七十初心在。”同时，在观看舆地图时流露出来的“以国为家”的深沉焦虑，实是对家的现实提醒，也是无家可归的一种记忆。宫廷基址、都城和燕云十六州在舆地图中被重点标注出来，成全了舆图观看者的帝国想象。

三、结 语

舆地图不仅代表空间地理，更是帝国权力的象征，具有不同凡响的政治意义。如新称帝的汉光武帝于公元26年在展开舆地图时指出：“天下郡图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邓禹）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27]光武帝的轶事将皇帝阅读舆地图与恢复统一的政治抱负联系起来。然而，直到11世纪末，浏览或阅读舆地图或多或少都是皇帝和朝廷的特权。它们有限的读者群和发行量，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使得12世纪之前的地图原件和复制品都没有保存下来。

至南宋，无论是作为学术话语对象还是业余话语对象，舆地图因各种媒介尤其是印刷术的大大发展和科举考试的影响在士人读者中变得容易获取。士人精英秉持着“中国”观念并参照《禹迹图》和《华夷图》的模型构建起舆地图的历史。在这些舆地图中，对永恒的“中华帝国”空间特征的定义和坚持，标志着宋代精英们政治理想和身份认同历史的重大转变。尤其是，南宋士人还业余绘制舆地图。朱熹认为任何学者都有能力绘制地图，《朱子语类》载：“要作地理图三个样子：

一写州名，一写县名，一写山川名。仍作图时，须用逐州正斜、长短、阔狭如其地形，糊纸叶子以剪”^[28]。永嘉学派创始人薛季宣曾在《答君举书》一书中与陈傅良分享绘制舆地图的进展：“《州图》纳去荆州、南交二纸，抄毕蚤希寄示。杨、冀草具未补，梁州和夷未曾释地，幽、雍都未下手。”^[29]相较于官方舆地图，私人绘制的舆地图更能透露出士人施加权力和定义自我身份的明显意图。

北宋灭亡的惨痛历史、北方大片领土的沦陷、南宋王朝的偏安统治促进了士人精英与舆地图的联系。这种联系往往聚焦于恢复的宏愿。值得注意的是，诸如《历代地理指掌图》坊刻本中出现的地图虽然是在北方沦陷之前绘制的，但只有当它们成为王朝过去且应该被恢复的象征时，它们的流通才更有可能被记录下来。换言之，地图现在与国家记忆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地面上的现实联系在一起。文人们在诗文中记录他们阅读舆地图的情景。在这些诗文中，舆地图意味着对失地的提醒、对家园的记忆及对故国的想象。文人们通过泪水、家国、故都等诸多隐喻表达了他们阅读舆地图的深切感受和力主恢复的强烈渴望。

参考文献：

- [1] 福柯. 权力的地理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4.
- [2] 葛兆光. 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49.
- [3] 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 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154.
- [4] 郑锡煌. 北宋石刻“九域守令图”[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2(2): 144-149.
- [5] 崔瑞德, 史乐民. 剑桥中国宋代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657-659.
- [6] 钱正, 姚世英. 坠理图碑[M]//曹婉如. 中国古代地图集: 战国一元.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46-47.
- [7] 黄盛璋. 宋刻舆地图综考[M]//曹婉如. 中国古代地图集: 战国一元.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61-64.
- [8] 曹婉如. 中国古代地图集[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①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简要回顾了关于收复十六州的讨论。我们注意到中华书局版（卷6，第53页）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卷6，第31页）中，“幽蓟”作“幽燕”，它也常被用来指燕云十六州。

- 1997.
- [9] 税安礼. 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M]. 赵亮夫, 增补.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10] 管彦波. 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 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J]. 青海民族研究, 2017(1): 100-105.
- [11] 潘晟. 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175-178.
- [12] 魏希德. 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 信息、领土与人际网络[M]. 刘云军,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
- [13] 朱熹. 朱熹集[M]. 郭齐, 尹波, 点校.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 1669.
- [14] 贾志扬. 宋代科举[M]. 台北: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5: 35.
- [15] 费衎. 梁溪漫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864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732.
- [16] 程端礼.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M]//四部丛刊续编.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6: 4.
- [17]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李逸安,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2816.
- [18] 钱钟书. 宋诗选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
- [19] 杨万里. 杨万里集笺校[M]. 辛更儒, 笺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403.
- [20] 许倬云. 我者与他者: 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82.
- [21] 范成大. 范成大笔记六种[M]. 孔凡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12.
- [22] 楼钥. 攻媿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53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698.
- [23] 傅璇琮. 全宋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24] 陆游. 剑南诗稿校注[M]. 钱仲联, 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25] 刘克庄. 后村先生大全集[M]. 王贵蓉, 向以鲜, 校点.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 92.
- [26] 段义孚. 空间与地方: 经验的视角[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128-148.
- [27]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600.
- [28]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王星贤,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30.
- [29] 薛季宣. 浪语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1159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384.

[责任编辑 张鹏宇]